

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

方克立·李錦全

主編



現代
新儒家
與
西方哲學

● 趙德志 著
● 遼寧大學出版社

90066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现代新儒家与 西方哲学

赵德志 著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1994年·沈阳

(辽) 新登字第9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赵德志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2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方克立 李锦全主编)

ISBN 7-5610-2505-X

I. 现…

II. 赵…

III. 新儒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比研究

IV. ①B222-03②B50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1660号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方克立 李锦全主编

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

赵德志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20千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刘万泉	封面设计：安今生
赵光辉	版式设计：郭 阳
	责任校对：杜 秋

ISBN 7-5610-2505-X
B·106 定价：9.50元

丛书主编的话

这是一套以现代新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丛书。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七十年来它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学脉和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就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而言），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很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前期发展，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清理和总结。现代“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等概念就是贺先生最先明确提出来的。

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学宗师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港台继续大力推进新儒学运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2年，美籍华裔学者张

源写成《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最早刊出于1976年出版的英文论著《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中）一文，开始从总体上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对新儒学进行反省的，但并不只是简单的批评与否定。同样站在自由主义立场的台湾学者韦政通，这一年也撰有《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一文，对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观念进行了批判的审视。把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专门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学术工作，在港台、海外可以说从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起步要晚得多。八十年代中期，杜维明等海外华裔学者大力宣传“复兴儒学”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在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大陆学界才对现代新儒学（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它在港台和海外的的发展）逐渐有所接触和了解，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对这项研究工作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课题组成员不得不从搜集、阅读最基本的图书资料开始，包括几代新儒家学者的著作和海内外的有关研究资料，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在“七五”期间完成的一项主要工程就是编撰《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同时编辑出版了一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共十五册），首先把克服种种困难多方搜集来的基本资料加以初步整理，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国内的读者。研究工作是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在过去几年里，课题组成员除了已经出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现代新儒学研究》（宋志明）、《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冯友兰新理学研究》（田文军）等几部专著外，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近二百篇论文（包括收入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集中的文章)。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完全隔膜的情况,而且引起了港台、海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甚至连新儒家学者也惊异地发现:“有些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却先做了”,并以“我们也要加紧做,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自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因此而有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撰著和出版一套包括专人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系列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是课题组下一步研究工作所要达致的目标。专人研究系列是对第一、二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新儒学思想,分别进行系统地研究和评述,重点是研究他们的古今、中西文化观和哲学、宗教、伦理思想;对于那些活跃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则需同时注意研究他们的现代儒家政治思想。总之,既要揭示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性,也要写出每个人思想的个性。专题研究系列是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别专门研究,例如对其哲学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宗教观、伦理观、人生哲学、文化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等,运用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和阐论。又如对现代新儒学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承继渊源关系或对立互动关系,分别加以系统地考察,也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内容。这两个系列的论著都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加强理论分析,总结对现实有启迪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写成和出版,能把国内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承担《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写作任务的,大部分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有的还是在读博士生(他们承担的研究课题往往就是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锐敏,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探索精神,所

以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创新见解，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洋，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着这方向努力去做。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两个要求。但是也不必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册论著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地方，甚至错误失当的地方，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恳切地期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让这套丛书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锻炼造就一代学术新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辽宁大学出版社分别承担了本丛书的专人研究系列和专题研究系列的出版任务，给我们的工作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方克立 李锦全

1991年12月10日

目 录

导论：“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家

第一章 现代新儒家发端的理论机缘

- 第一节 从科学追求到科学崇拜 10
- 第二节 欧战危机与传统的重新估价 15
- 第三节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20

第二章 梁漱溟与柏格森

- 第一节 对唯科学主义的理论诘难 28
- 第二节 基于生命观念的文化哲学架构 32
- 第三节 儒家思想的生命意义的抉发 41

第三章 熊十力与生命哲学

- 第一节 于形上层面对西学 49
- 第二节 由生命哲学启示的本体论洞见 53
- 第三节 由生命哲学反显的道德形上学 63

第四节	略论第一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	77
-----	---------------------	----

第四章 冯友兰与新实在论

第一节	“西学华化”的第二代新儒家	81
第二节	与维也纳学派的论辩	86
第三节	新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启示	96
第四节	儒家人生哲学的理性化	109

第五章 贺麟与新黑格尔主义

第一节	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与态度	122
第二节	“新心学”的新课题	131
第三节	“心物一体”关系的新说明	140
第四节	“知行合一”观念的新论证	149

第六章 唐君毅与黑格尔哲学

第一节	第三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宣言	160
第二节	中西冲突再反省下的文化抉择	169
第三节	衍生于绝对理念的文化哲学	175
第四节	心通九境的唯心论体系	186

第七章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第一节	由中西意识再比较所见的历史课题	200
第二节	由自律道德所见的宋明儒学	209
第三节	由道德形上学所见的康德哲学	220
第四节	接着康德讲的“两层存有论”	232

第八章 刘述先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双重困境的哲学反思·····	247
第二节	未来形上学改造方向的预测·····	256
第三节	系统哲学的初步探索·····	263

第九章 成中英与哲学解释学

第一节	本体诠释学与“统一的世界哲学”·····	271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280
第三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示范性重建·····	290
第四节	第四代新儒家的开放性心灵·····	296

结语：现代新儒家“西学观”的初步检讨

后记·····	309
---------	-----

导论：“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家

由梁漱溟、熊十力开其端绪，经冯友兰、牟宗三等进一步发展，并于当前仍活跃于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学，之所以被称为“儒学”，乃在它的哲学主要是从传统儒学出发，具有儒学的最一般的特征；而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儒学，则又在于它通过援入西学来重建传统和走出传统，具有“现代哲学”的面貌和品格。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西方哲学大规模输入的冲击，就不会产生现代新儒学，没有基于传统对西方哲学的越来越内在的融会，就没有现代新儒学持续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这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现代新儒学的产生，表现了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受到巨大冲击而显著衰落之后，为了重新复活儒学，确立其在现代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一种努力，是对“五四”时代西方哲学大规模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①

“五四”时期西方哲学的大规模输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将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视为“最新的科学”加以推崇，将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追求发展成为对科学的崇拜，将人们向西方近代

^① 见方克立：《“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家》，《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文明所包含的真理的探索发展成为全盘西化运动。这种科学崇拜倾向，思想史家称之为“唯科学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一、对科学力量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认为科学的完善与进步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和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科学是现代文明的同义语；二、对传统的价值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坚持一种实证的思考模式，反对任何不能证实的东西；三、以科学崇拜代替宗教崇拜，认为科学是达到“全然真实”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可以解决信仰、价值和自由等等所有精神领域的问题。

唯科学主义的兴起，客观上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科学的要求，其重分析、重实证的理性精神，也的确切中了中国传统哲学师心自用、玄想盲从的弊病，因而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但唯科学主义也把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些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传统并非一无是处，科学并不能代替哲学与宗教，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还需要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提供支持力量。如是，如何认识科学与道德、知识与价值、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唯科学主义还在凯歌行进之时，就成为人们论辩的热点。正是在此论辩中，产生了以梁漱溟和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

作为唯科学主义的反对者，梁漱溟与熊十力共同的致思方向，就是努力将世界区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依此界定科学与道德、西学与中学以及实证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分野，并突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价值与地位。而为他们这种区分提供重要理论启发的，恰恰又是“五四”时期输入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在对待生命哲学的态度上，梁漱溟与熊十力尽管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们都以柏格森的“生命——自然”这一两分的世界模式去打击唯科学主义，证明人类的精神、意志和生命等与物质完全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理智不可能达到唯一的真实存

在——生命。因而，科学也绝不可能取代传统的精神价值，不能取代哲学和道德。

另外，他们也都借助于柏格森的流动、创造的生命观念，重新抉发孔子儒家思想的“真义”，不仅将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一活的生命展示出来，而且赋予儒家所挺立的仁体本心以宇宙本源的地位和流动、创造的特性，使此本体仁心有了一更为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和更多的动力论性格。

梁漱溟与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初创者，对西方哲学尚知之不多。也由于要集中反对西化运动和唯科学主义，他们的理论注意力还更多地放在中西哲学的相互区别与中国传统思想独特价值的维护上。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援入还不是自愿和自觉的。他们所能做的，还只是依靠自己的神解妙悟，从西方哲学中获得某种理论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引起的民族生存危机的步步加剧，使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也为一切主张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想派别，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而一个时期以来对涌入的西方哲学的逐步学习与了解，包括二三十年代对逻辑实证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绍述，也为现代新儒家比较内在地吸收和转化西方哲学提供了可能。不同的是，此一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不仅注意东西哲学之异，而且更注重两者之同，努力尝试在中西哲学更内在的融合中为儒家思想打开一条再生之路。

首先是贺麟，一方面将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认为民族的独立首先应是在文化上掌握自主权、富有生命力，而中国民族欲想在文化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吸收、转化和超越西洋文化；一方面，又提出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中国哲

学的再生之路，就在于用代表西洋正统的德国古典哲学发挥代表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

其次是冯友兰，一方面在文化上以“个体——类型”理论，证明文化从古代类型发展到现代类型，是一切民族文化必然要经历的共同道路，中国如欲摆脱被奴役欺辱的地位，就必须将自己的文化从古代的农业类型转入现代的工业类型；另一方面，又提出任何民族的哲学都有“益道”、“中道”、“损道”三种形态，都有分析的与直觉的两种方法；但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必须将逻辑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哲学。

贺麟与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共同特色，都是尽可能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获得方法论的启示，用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特征的理性精神和思辨方法重铸儒家哲学，使之带有现代哲学注重认识论、强调逻辑分析的性格，成为与中国步入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贺麟努力使重逻辑认知和理性思辨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与注重道德评价和直觉体悟的陆王心学相结合，尝试从陆王挺立的心性主体中开出一逻辑主体。同时，又用新黑格尔主义的心物论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说明心体物用和知行合一。至于冯友兰，则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去清洗梳理程朱理学，用分析命题引伸出理学中标志宇宙本体的四个重要范畴，赋予理学以现代的知性品格。

贺麟、冯友兰都是留学欧美且专治哲学的学院式学者，对西方哲学既有较为开放的襟怀又有比较精密真实的把握。因而，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援引便相对内在而自觉。他们有关中国哲学逻辑化、知性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了对传统儒学的超越。但他们对西学的掌握和了解还多限于其所师事的一宗一旅，其融合视野仍不够宽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大陆指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现代新儒家遂移师港台和海外，在六、七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流落海外的花果飘零的境遇，使此一时期的新儒家怀有更为强烈的承继传统的使命感；而沐浴西方现代文明之风的生活现实，又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在维护传统、“摄智归仁”的同时，更加努力地通过援入西学去“返本开新”。

六、七十年代新儒家哲学活动的共同特点，是综合前两代新儒家的理论思路与融合导向，一方面，针对西方哲学关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偏见，和所谓由文化脱序引起的意义迷失与形上迷失，远承熊十力重建心性本体的血脉，细密地爬梳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努力证明儒家思想绝不只是一种道德说教和一些外在的规范教条，它实包含一统一伦理道德实践与宗教超越情感的形上学，它永远是人类得以自我安顿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又面对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国文化步步退却的现实，近续冯友兰、贺麟将儒家思想知性化、逻辑化的事业，广泛地吸收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精神与思辨方法，甚至理论框架，以期从儒家心性之学中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由传统内圣之学开出新的外王，为科学和民主奠立一内在的根据。

在此期间，唐君毅吸取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的智慧与理路，借助黑格尔的三段式方法与华严宗的框架结构，构筑了一个心通九境、综罗中外百家的绝对唯心论体系，以之展现人类心灵的全部内涵与层级结构，赋予儒家哲学所挺立的道德心灵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强劲的生命力。而牟宗三则谋求儒家传统与康德哲学的融合，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并用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他在哲学上步步解析康德的进路，又步步扭转康德以显示儒家形上学的真貌。这表现在他虽然与康德

同样从道德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讲起,但却将自由意志等同于本心良知,提出人有的智的直觉,可以直接把握到此良知本体。不仅如此,他更试图超越康德,主张良知不仅是道德实践的根据,而且也是存有生化之源;此良知本身即一无执的存有,是道德之所以可能的先验根据,良知经“自我坎陷”又可转为—知性主体,开出现象界的存有,成为科学与民主建立的内在条件。

为重建儒家的形上学,牟宗三等均以半生之力专志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诠释工作。他们将西方哲学的古典传统展示于人,融入自己的哲学创作,真正实现了贺麟所谓“以西方正统哲学发挥中国正统哲学”的任务。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析及铺陈,也更趋于精密。但因受限于时间,他们还不曾深入地体认到当代西方朝气蓬勃的勉力前进的精神,“换言之,他们并没有与西方面对面亲身缠斗奋战的持久经验。他们虽为后世的承继者开拓了一条精致雅驯的理解大道,但其概念思考资具仍未充分发挥。而就处理东西交流问题所必须开发的共同据点而言,他们尚未能达到理想的目标。”^①

时至八十年代,一代新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他们大多是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学生,因而理论致思方向与他们的老师们并无原则上的不同。但长期生活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经历,与西方面对面亲身缠斗的持久经验,以及完全陶冶浸润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却使这一代人物的心智更具分析的触角,心灵更加拓展开放。如果说,唐、牟的思维方式仍受黑格尔、康德的支配,那么此一代人物的哲学思考则完全以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作为背景。再如果说,前几代新儒家哲学活动的目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93页。

标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学的重建，那么这一代人物则将儒学复兴问题与当代整体人类精神危机、生存危机的解决统一起来思考，在努力摆脱传统儒学困境的同时，还尝试为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打开一条出路，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后”的条件下，为人类寻找一自我安顿的精神家园。

如是，第四代新儒家哲学上的特征便在于：从整体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看待传统儒家思想的重建，视中西哲学的互相融会为建立一统一的世界哲学所必经的本体与方法、价值与知识的互动过程，尽可能地以现代人类的思考和经验所展现的精神要求及社会发展正途作为标准，作出理论上的取舍和抉择。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既注意从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智慧，更注意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从现代西方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寻找人类未来文化发展应取的方向。如就刘述先而言，其哲学创造的立基点不仅仅是中国儒家思想，而且广含了现代西方存在主义、语义哲学、解释哲学以及哲学人类学各派的观点。就成中英来说，则更注意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获得理论创造的启示，尝试建立一种逻辑地浓缩现象学、结构主义、过程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而又融进《周易》整体定位思想的“本体诠释学”。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第四代新儒家人物还积极尝试如何在心性哲学的基础上开拓出现代人类生活的实践模式，他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新儒家前途之是否光明，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他们所谓新外王的问题。”^①因而，他们已不满足于现代新儒学仅仅作为儒学复兴的象征，仅仅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凌空虚悬于

① 刘述先：《大陆与海外》，转引自《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编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